

古史辨

【

11.3/18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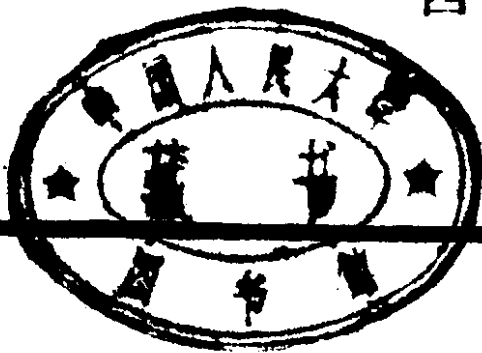
1043136

羅根澤 編著

古史辨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四



古史辨
四

羅根澤 編著

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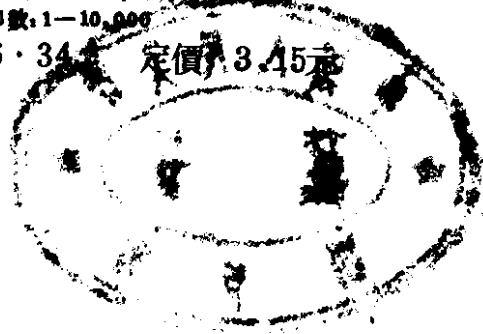
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大統印刷廠印刷

開本 850×1156 1/32 插頁 1 印張 24.25

1982 年 8 月第 1 版 198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數: 1—10,000

統一書號: 11186·34 定價: 3.45 元



古史辨

第四冊

諸子林叔攷

羅根澤編著
容錦熙題

孔子修成康之道，述周公之訓，以教七十子，使服其衣冠，脩其篇籍：故儒者之學生焉。

墨子學儒者之業，受孔子之術，以爲其禮煩擾而不悅，厚葬靡財而貧民，久服傷生而害事：故背周道而用夏政……節財，薄葬，閑服生焉。

齊桓公之時，天子卑弱，諸侯力征，南夷北狄，交伐中國，中國之不絕如線；齊國之地，東負海而北障河，地狹田少而民多智巧，桓公憂中國之患，苦夷狄之亂，欲以存亡繼絕，崇天子之位，廣文武之業：故管子之書生焉。

齊景公內好聲色，外好狗馬，獵射忘歸，好色無辨，作爲路寢之臺，族鑄大鐘，撞之庭下，郊雉皆鳴，一朝用三千鐘，梁邱據子家噲導於左右：故晏子之諫生焉。

晚世之時，六國諸侯，谿異谷別，水絕山隔，各自治其境內，守其分地，握其權柄，擅其政令，下無方伯，上無天子，力征爭權，勝者爲右，恃連與國，約重致，剖信符，結遠援，以守其國家，持其社稷：故縱橫脩短生焉。

申子者，韓昭釐之佐。韓，晉別國也，地墮民險，而介於大國之間，晉國之故禮未滅，韓國之新法重出，先君之令未收，後君之令又下，新故相反，前後相繆，百官背亂，不知所用：故刑名之書生焉。

秦國之俗，貪狠，強力，寡義而趨利，可威以刑，而不可化以善，可勸以賞，而不可厲以名，被險而帶河，四塞以爲固，地利形便，畜積殷富，孝公欲以虎狼之勢，而吞諸侯：故商鞅之法生焉。

顧序

宇之廣，宙之久，材料是找不盡的，問題是提不完的。何況一種學問已有了二千餘年的積聚，現在剛把傳統的態度澈底改變，開手作全盤的清理之時，其困難煩亂之狀豈是想像得出的。我編印了三冊古史辨，每每有人問我，『古史辨出齊了嗎？』我只得笑應之曰，『這書沒有出齊的日子，希望到我死後還有人繼續編下去呢。』因想起三年前在廣東時，有一位青年選修了我的課，耐不住了，焦躁地喊道，『我對於古史愈疑愈多，更碰更繁，越深入越不見底了！我看你找了無數材料，引了無數證據，預料定有斷然的結論在後頭，但末了仍是黑漆一團。如何你十年前的懷疑，到此刻仍未確定呢？我等待不及了！』他說的話是真心話，定然代表一部分人對我的感想。我慚愧我沒有法子使他們滿意，因為我的工作本來不是一服急效的藥劑，供應不了他們的需要。

秦漢間的方士常說海上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即。我們對於古史，正有同樣的感覺。在許多條件沒有比較完備的時候，要找得一個系統也是可望而不可即的。條件是什麼？許多現存材料，應當依着現在的歷史觀念和分類法去整理一過，此其一。許多缺着材料要考古學家多多發見，由他們的手裏給與我們去補綴，此其二。以前學者提出的問題，哪些是已解決的，哪些是待解決的，哪些是不能解決的，應當審查一下，結一清賬，此其三。現在應當提出的新問題是什麼，這些新問題應當怎樣去謀解決，應當計畫一下，此其

四。這舊材料和舊問題的整理已經够許多人的忙了，何況加以新材料和新問題的出現，更哪裏是少數人的力量所能包辦的！至少的限度，必須對於舊的有了過半數的認識，對於新的有了大體的預測，纔可勉強搭起一座架子來，稱之爲假設的系統。這件事，現在能做嗎？數年以來，一般人不耐沒有系統，但也不耐費了大功夫去搜集材料和推敲問題，於是只在傳統的文獻裏兜圈子，真的不足，把偽的續，只要給渺茫的古人穿上了一身自己想像中的衣服，就自以爲找到新系統了。唉，除了自欺欺人之外，世界上還哪裏有這樣容易的事情！我儘可以給他們同情心，因爲『慰情聊勝於無』是人類的通性。但我的治學的責任心不許我這樣幹：它只願我一塊磚一塊瓦地造起屋子來，不願海市蜃樓在彈指之頃立現，也在彈指之頃消失。如果青年們因此而唾罵我爲落伍者，那也得聽之。

可是系統和結論，我雖不急急地尋求，究竟它們也常在我的心底盤旋，醞釀了好幾年了。今就作這序文的方便，略述所醞釀的如下：

我的研究古史的經歷甚簡單。幼年讀過幾部經書；那時適值思想解放的運動，使得我感到經書中有不少可疑的地方。其後又值整理國故的運動，使得我感到這方面儘有工作可做。因爲年輕喜事，所以一部分的材料尚未整理完工，而議論已先發表。遭逢時會，我所發表的議論想不到竟激起了很多人的注意，盜取了超過實際的稱譽。在友朋的督促之下，編印了古史辨第一冊。我向來對於學問的嗜好是很廣漠

的，到這時，社會迫着我專向古史方面走去；我呢，因為已出了書，自己應當負起這個責任來，所以也把它看作我的學生工作的對象。

自從發表了幾篇古史論文之後，人家以為我是專研古史的，就有幾個大學邀我去任『中國上古史』的課；我惟有遜謝。這不是客氣，只因擔任學校的功課必須具有系統的知識，而我僅作了些零碎的研究：自問圖樣未打，模型未製，就造起渠渠的夏屋來，豈不危險。若說不妨遵用從前人的系統，那是違背了我的素志，更屬不可。可是受着生計的驅策，使我不得不向大學裏去討生活。民國十六年的秋天，我到廣州中山大學，到的時候已開課了，功課表上已排上了我的『中國上古史』了，而且學生的選課也選定了。這一次我真把我急得非同小可：這事怎麼辦呢？沒有辦法，只得不編講義而專印材料，把許多零碎文字鈔集一編，約略組成一個系統。那時所印的材料分作五種：

甲種——上古史的舊系統（以史記秦以前的本紀世家為代表。）

乙種——甲種的比較材料（一，史記本紀世家所根據的材料；二，其他真實的古史材料。現在看來，這兩類不

應合在一起。）

丙種——（一）虛偽的古史材料；（二）古代的神話傳說與宗教活動的記載。

丁種——古史材料的評論。

戊種——預備建立上古史的新系統的研究文字。

那時搜集到的材料約有二百萬言，在一個學校的功課裡已不能算少，但自問把這些材料系統化的能力還差得遠；而且範圍太大，一個人也不能同時注意到許多方面。因此，我覺得有分類編輯古史材料集的需要。但這是一個學術團體的事，或是一個人的長期工作，決不是教書辦事終日亂忙的我所能擔負的。

爲了北平的環境適宜於研究，所以十八年就回到這舊遊之地來，進了燕京大學。來的時候，『中國上古史研究』的課目也早公佈了。幸而我有兩年來的預備，不致像那時般發慌。但年前編的是些零碎材料，沒有貫穿的，現在則不該如此了。計畫的結果，擬就舊稿改爲較有系統的敘述，凡分三編：

甲編——舊系統的古史。

乙編——新舊史料的評論。

丙編——新系統的古史。

可是不幸得很，編了一年，甲編尚未編完，更說不到乙丙兩編。所以然者何？只因舊系統方面，我想編四個考：（一）辨古代帝王的系統及年歷，事蹟，稱之爲帝繫考。（二）辨三代的文物制度的由來與其異同，稱之爲王制考。（三）辨帝王的心傳及聖賢的學派，稱之爲道統考。（四）辨經書的構成及經學的演變，稱之爲經學考。這四種，我深信爲舊系統下的偽史的中心；倘能作好，我們所要破壞的偽史已再不能支持其壽命。我很想作成之後合爲古史考，與載零碎文字的古史辨相輔而行。可是一件事情，計畫容易，實做甚難。帝繫，道統兩考比較還簡單；而王制和經學的內涵則複雜萬狀，非隱居十載簡直無從下手。因此，在燕大所編的上古史

講義只成了帝繫考的一部分：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（清華學報六卷一期）即是這一部分中的一部分。

此後爲了預備作王制考，改開了尚書研究一課，一篇篇地教讀，借它作中心而去吸收別方面的材料。工作的情况，誠有如某君所云，『愈疑愈多，更碰更繁，越深入越不見底。』不過，我不像他那樣急性，決不以『黑漆一團』而灰心。我總希望以長時間的努力，得到一部分的『斷然的結論』來告無罪於讀者。

這一個計畫，蓄在我的心頭已三年多了。我自信這是力之所及，只要肯忍耐便有成就之望的。所以沒有發表之故，只因怕惹起了急性的讀者們的盼望和責備。現在強鄰逞暴，國土日蹙，我們正如釜中之魚，生死懸於人手，不知更能讀幾天書，再得研究幾個題目。就算苟全了性命，也不知道時勢逼着我跑到什麼地方，熱情逼着我改變了什麼職業。如果不幸而被犧牲了，那在民族與國家的大損失中也算不了一回事。但中國不亡，將來這方面的研究是一定有本國的同志起而繼續之的，我很願他參考我的計畫。所以現在略略寫出我對於這四種的意見：

我們的古史裏藏着許多偶像，而帝繫所代表的是種族的偶像。所謂華夏民族究竟從哪裡來，它和許多鄰境的小民族有無統屬的關係，此問題須待人類學家與考古學家的努力，非現有的材料所可討論。但我們從古書裏看，在周代時原是各個民族各有其始祖，而與他族不相統屬。如詩經中記載商人的祖先是『天命玄鳥』降下來的，周人的祖先是姜嫄『履帝武』而得來的，都以爲自己的民族出於上帝。這固然不可信，但當時商周兩族自己不以爲同出於一系，則是一個極清楚的事實。左傳上說，『任，宿，須句，顓臾，風』

姓也，實司太皞與有濟之祀，『則太皞與有濟是任宿諸國的祖先。又說，『陳，顓頊之族也，』則顓頊是陳國的祖先。至於奉祀的神，各民族亦各有其特殊的。如左傳上說蘇爲夏郊。又如史記封禪書上說秦靈公於吳陽作上時，祭黃帝；作下時，祭炎帝。這原是各說各的，不是一條綫上的人物。到了戰國時，許多小國併吞的結果，成了幾個極大的國；後來秦始皇又成了統一的事業。但各民族間的種族觀念是向來極深的，只有黃河下流的民族喚做華夏，其餘的都喚做蠻夷。疆域的統一雖可使用武力，而消弭民族間的惡感，使其能安居於一國之中，則武力便無所施其技。於是有幾個聰明人起來，把祖先和神靈的『橫的系統』改成了一縱的系統，『把甲國的祖算做了乙國的祖的父親，又把丙國的神算做了甲國的祖的父親。他們起來喊道，『咱們都是黃帝的子孫，分散得遠了，所以情誼疏了，風俗也不相同了。如今又合爲一國，咱們應當化除畛域的成見！』這是說話，卻很可以匡濟時艱，使各民族間發生了同氣連枝的信仰。本來楚國人的缺舌之首，中原人是不屑聽的，到這時知道楚國是帝高陽的後人，而帝高陽是黃帝的孫兒了。本來越國人的文身雕題，中原人是不屑看的，到這時知道越國是禹的後人，而禹是黃帝的玄孫了。（國語中史伯之言，越本序姓；但到這時，也只得隨了禹而改爲姬姓了。）最顯著的，當時所謂華夏民族是商和周，而周祖后稷是帝嚳元妃之子，商祖契是帝嚳次妃之子，帝嚳則是黃帝的曾孫，可見華夏的商周和蠻夷的楚越本屬一家。借了這種帝王系統的說話來收拾人心，號召統一，確是一種極有力的政治作用。但這種說法傳到了後世，便成了歷史上不易消釋的『三皇五帝』的癥癥，永遠做真史實的障礙。（如有人說：中國人求國結還來不及，怎可使其分

敵。照你所說，漢族本非一家，豈不是又成了分離之兆。我將答說：這不須過慮。不但楚，越，齊，周已混合得分不開，即五胡，遼，金諸族也無法在漢族裡分析出去了。要使中國人民團結，還是舉出過去的同化事實，積極移民邊陲，鼓勵其雜居與合作。至於歷史上的真相，我們研究學問的，在現在科學昌明之世，決不該再替古人圓謊了。）除了種族的混合之外，陰陽五行的信仰也是構成帝繫說的一個重大原因。

王制爲政治的偶像，亦始創於戰國而大行於漢。古代對於先朝文獻本不注意保存，執政者又因其不便於自己的行事，加以毀壞。所以孔子欲觀夏殷之禮，而杞宋已不足徵；北宮錡問周室班爵祿事，而孟子曰：『其詳不可得聞也，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。』但戰國的諸子同抱救世之心，對於時王之制常思斟酌損益；而儒家好言禮，所改造的制度尤多。又慮其說之創而不見信，則託爲古代所已有。淮南子修務訓所謂『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賤今，故爲道者必託之於神農黃帝而後能入說。亂世闇主高遠其所從來，因而貴之。爲學者蔽於論而尊其所聞，相與危坐而稱之，正領而誦之，』直是說盡了這班造僞和信僞的人的心理。所以三年之喪則之於堯典，五等之爵著之於春秋，而人遂無有疑者。同時出了一個鄒衍，他杜撰五德終始說，以爲『五德轉移，治各有宜，』政治制度應由五德而排成五種。他們說，黃帝爲土德，夏爲木德，商爲金德，周爲火德，秦爲水德，漢又爲土德；這各代的制度遂各不相同，惟漢與黃帝以同德而相同。稍後又出了一種三統說，截取了五德說的五分之三而亦循環之，於是政治制度又分爲三種。他們說，夏是黑統，商是白統，周是赤統，繼周者（春秋與漢）又爲黑統。有了這樣的編排，而古代制度不必到古國去尋，也不必向古籍裏

找，只須畫一五德三統的表格，便自會循次地出現。例如禮記檀弓中說，『夏后氏尙黑，大事歛用昏，戎事乘騂（黑馬），牲用玄。殷人尙白，大事歛用日中，戎事乘翰（白馬），牲用白。周人尙赤，大事歛用日出，戎事乘騂（赤馬），牲用騂。』懂得了三統說的方式，就知道這一個禮制單是這樣地推出來的。如月令十二紀，則是五德說支配下的禮制。其中所謂五時，五方，五帝，五神，五祀，五蟲，五畜，五數，五音，五色，五味，五臭……莫不是從五行上推出來的。人事哪能這樣整齊，又哪能這樣單調！董仲舒所作的三代改制質文篇，寫的推求的方式尤爲顯明。照他所說，自神農至春秋十代的禮制俱可一目了然；不但如此，推上推下可至無窮，真是『雖百世可知也！』照他所說，古代帝王儘不必有遺文留與後人，只要把他們的代次傳了下來，即可顯示其一切。以我們今日的理智，來看他們的古史，不禁咋舌。但是都假了嗎？那也不然，他們總有一些兒的依傍。如上所舉，周人尙赤，牲用騂，乃由洛誥『文王騂牛一，武王騂牛一』及論語『犂牛之子騂且角，雖欲勿用，山川其舍諸』來。是則檀弓所言，別的均假，惟此不假。推想其他單子，亦當如此。即如明堂月令中說得轟轟烈烈的當然是假，後儒把許多不相干的什麼文祖，太廟，衛室，總街……都說成明堂也當然是附會，但孟子裡的齊宣王欲毀明堂一事則不假。究竟三禮中有多少是真的，多少是假的，這是一件極難斷定的事情。這種的分析，將來必須有人費了大功夫去做。其術，應當從甲骨文中歸納出真商禮，從金文、詩、書、春秋、左傳、國語中歸納出真周禮，史記、漢書中歸納出漢禮，而更以之與儒家及諸子所傳的禮書禮說相比較，庶幾可得有比較近真的結論。

道統是倫理的偶像。有了道統說，使得最有名的古人都成了一個模型裏製出來的人物；而且成爲一個集團，彼此有互相維護的局勢。他們以爲『天不變，道亦不變』，凡是聖人都得到這不變之道的全體。聖與聖之間，或直接傳授，或久絕之餘，以天亶聰明而紹其傳。最早的道統說，似乎是論語的末篇，『堯曰：「咨爾舜，天之歷數在爾躬！允執其中！四海困窮，天祿永終！」舜亦以命禹，』見得堯傳舜，舜傳禹，聖聖傳心，都在『執中』一言。下面記湯告天之詞，記武王大賚之事，見得湯與武王雖不能親接堯舜禹，而心事則同，足以繼其道統。但論語末數篇本有問題，此所謂『天之歷數』頗有五德轉移的意味，『允執其中』亦是儒家中庸之義，疑出後儒竊入，非論語本有。推測原始，當在孟子。盡心篇的末章說，堯舜後五百餘歲，湯聞而知之；湯後五百餘歲，文王聞而知之；文王後五百餘歲，孔子聞而知之；見得孔子的道即是堯舜的道，相去千五百餘年沒有變過。孔子以後，他以爲沒有聞道的了，所以以一歎結之。然孟子常說『私淑諸人』，『乃所願則學孔子』，可見他是聞孔子之道的，也就是直接堯舜之傳的。他說這番話，不過爲自己占地位。後人讀到這一章，輒不自期地發生思古之幽情，有志遠紹聖緒。如司馬遷說，『自周公卒，五百歲而有孔子；孔子卒後，至於今五百歲，有能紹明世，正易傳，繼春秋，本詩書禮樂之際，意在斯乎！意在斯乎！小子何敢讓焉！』（史記自序）這就可見孟子的話發生了有力的影響。其後揚雄、王通、韓愈等各欲負荷這道統，不幸沒有得到世人的公認。到宋代理學興起，要想把自己一派直接孟子，以徒黨鼓吹之盛，竟得成功，而濂洛關閩諸家就成了儒教的正統，至今一個個牌位配享在孔廟。這個統，自堯舜至禹湯，至文武周公，至孔孟，又至周程們，把古代

與近代緊緊聯起。究竟堯舜的道是什麼？翻開經書和子書，面目各各不同，教我們如何去確定它？再說，

孔孟之道是相同嗎？何以孔子稱美管晏而孟子羞道之；何以孔子崇霸業而孟子崇王道？即此可見孔孟

之間相去雖僅百餘年，而社會背景已絕異，其道已不能不變，何況隔了數千百年的。至於宋之周程們，其道

何嘗得之於孔孟。周敦頤的學問受於陳搏，他是一個華山道士。太極圖是他們的哲學基礎，而這圖乃是

從仙人魏伯陽的參同契裏脫化出來的。所以要是尋理學的前緒，這條綫也不能挂在孔孟的腳下。他們

又從偽大禹謨中取出『人心惟危，道心惟微；惟精惟一，允執厥中』十六字算做堯舜以來聖人相傳的心法；

但這是從荀子所引的道經加上堯曰雜湊起來的，道經是道家的東西，依然不是堯舜之言，儒家之語。至於

堯舜以前，他們又要推上去，於是取材於易繫辭傳的觀象制器之章，而加上伏羲，神農，黃帝。只是這章文字

非用互體說和卦變說不能解釋，而這兩種學說乃西漢的易家所創造，不是真的古代紀載。道統說的材料

如此的一無可取，然而道統說的影響竟使後人感到古聖賢有一貫的思想，永遠不變的學說，密密地維護，高

高地鎮壓，既不許疑，亦不敢疑，成為各種革新的阻礙，這真是始作俑的孟子所想不到的成功。

經學是學術的偶像。本來古代的智識為貴族所獨占，智識分子只是貴族的寄生者。貴族有樂官，他

們收聚了許多樂歌，所以有詩經。貴族有史官，他們紀載了許多事件，所以有尚書和春秋。貴族有卜官，他

們管着許多卜筮的繇辭，所以有周易。貴族有禮官，他們保存許多禮節單，所以有儀禮。實在說來，幾部真

的經書都是國君及卿大夫士們的日常應用的東西，意義簡單，有何神秘。詩，書，禮，樂，是各國都有的。易和

春秋，是魯國特有的。

（左傳上記齊宣子聘魯，見易象與魯春秋，曰：「周禮盡在魯矣」，這句話大概可信。孟子上說，

「晉之乘，楚之檮杌，魯之春秋，一也；其事則齊桓晉文，其文則史」，可見同樣的記載春秋時代的史書，在魯的叫做乘，在楚

的叫做檮杌，在魯的叫做春秋。）孔子生在魯國，收了許多弟子，把魯國所有的書籍當作教科書，這原是平常的事。他死了之後，弟子們造成一個極大的學派，很占勢力，就把魯國的書加以潤飾（如儀禮的喪服，春秋的名號

和褒貶諸端），算作本學派的經典，這也是平常的事。戰國時，平民取得了政治上的地位，都要吸收智識，而當

時實無多書可讀，只有讀儒家的經。孔子之所以特別偉大，六經之所以有廣遠的流傳，其原因恐即在此。

到了漢代，孔子定為一尊，大家替他裝點，於是更添出了許多微言大義。他們把不完全的經算是孔子所刪，

把完全的算做孔子所作。於是經書遂與孔子發生了不可分解的關係，幾乎每一個字裏都透進了他的深

意。這還不管尊孔之極，把經師們所作的筆記難說也算做經，把儒家的學說也算做經，把新出現的偽書也

算做經，而有「十三經」的組織。十三經，何嘗連貫得起，只是從西周之初至西漢之末一千一百年中慢慢

地疊起來的。（若加偽古文尚書則歷一千三百餘年。）一般人不知道，以為十三經便是孔子，也便是道德，只要提

倡讀經，國民的道德就會提高，這真是白日做夢。講起一班西漢的經師，會占卦，會求雨，開口是禱祥，閉口是

災異，結果造成了許多讖緯，把平凡的人物都講成了不平凡的妖怪。東漢的經師講訓詁，當然好得多，可是

穿鑿附會的上夫也到了絕頂。例如鄭玄，他是一個極博的學者，卻有一個毛病，最喜歡把不一致的材料講

成一致。這類的事極多，試舉其一。禮記王制說，「公侯田方百里，伯七十里，子男五十里」是一種封國說。

周官職方氏則謂公方五百里，侯方四百里，伯方三百里，子方二百里，男方百里，又是一種封國說。這兩種說廣狹懸殊（前說的公國只一萬方里，後說的便有二十五萬方里），決合不在一起。但他想，周官出於周公已無疑，王制雖未標明時代，既在禮記中則亦必出周人，於是爲調和之說曰：『周武王初定天下，……猶因殷之地（指王制）以九州之界尙狹也。周公攝政致太平，斥大九州之界（指周官）制禮成武王之意。』（王制注）照他所說，是武王時的疆域計廣九百萬方里（王制：『四海之內九州，州方千里』），而周公時的疆域則廣一萬萬方里（職方氏：王畿方千里，外九服各方五百里）。何以周公時的國土曾大於武王時十一倍餘？要是作史的人照他所說的寫在書上，豈不成了周初歷史的一件奇蹟。然而學者相傳，『寧道周孔誤諱，言服鄭非』，鄭玄在經學上的威權直維持到清末。所以經學裏面不知道包含了多少違背人性和事實的說話，只是大家不敢去疑它。既不能把它推翻，而爲了敘述歷史的需要去使用它時又只能從這裏面去抽取材料，這幾何而不上他們的當。所以爲要瞭解經書的真相和經師的功罪，使古史不絀絆於經學，我們就不得不起來作嚴正的批評，推倒這個偶像。

這四種偶像都建立在不自然的一元論上。本來語言風俗不同，祖先氏姓有別的民族，歸于黃帝的一元論。本來隨時改易的禮制，歸于五德或三統的一元論。本來救世蔽，應世變的紛紛之說，歸于堯舜傳心的一元論。本來性質思想不一致的典籍，歸于孔子編撰的一元論。這四種一元論又歸於一，就是拿道統說來統一切，使古代的帝王莫不傳此道統，古代的禮制莫非古帝王的道的表現，而孔子的經更是這個道